

北京六·二六医疗队在渭源

□王校正 孙喜军

1965年6月26日,毛泽东同志发出了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重要指示。为响应这一伟大指示精神,贯彻落实卫生部提出的《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》,大批北京等地的医务工作者齐聚陇原大地,其中一部分来到了偏僻、荒凉、穷困、落后的渭源县会川人民医院。据统计,从1969年到1970年,先后有45位北京医疗队队员来到会川支援地方医疗卫生工作。其中,北京月坛医院38人,北京市第二医院6人,北京护国寺中医门诊1人;医疗队中,男14人,女31人;大学学历7人,中专6人,高中14人,初中9人,小学9人;有医疗业务人员34人,行政工勤人员11人。他们为了响应党的号召,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,远离家,为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,几十年如一日,克服重重困难,辛勤工作,挥洒汗水,为当地百姓身体健康,为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宝贵青春,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会川镇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南部,高寒阴湿,海拔超过2000多米,群众以农业为生,生活艰苦。当时的会川医院,基础条件非常差,典型的“一少四没”单位,房屋设施缺少,医疗队员无处住宿,只能分散安排在当地群众家中居住;没有诊疗场所,门诊诊疗工作无法开展;没有通电,夜间上班、治疗只能提着马灯,夜间急诊手术用蜡烛、手电筒照明。没有通讯设施,人员居住疏散,有了急诊病人只有派人到各家各户通知;医院没有接通自来水,用水需到路途较远的周家泉挑取。尽管条件如此艰苦,医疗队还是克服种种困难,想方设法开展诊疗工作,最

大限度救治患者生命。为保障医疗队定有所居,正常开展工作,加强基层卫生院、站的技术力量,原会川医院人员除包文谨、陈得廉外,其余人员全部下到各卫生院或村保健站工作。1971年,县政府筹措资金,新建二十多间约400多平方米的土木结构门诊部;1972年划拨土地,争取资金建起50多间约800多平方米的土木结构职工宿舍,才初步使基础设施得到改善,保证了门诊业务开展和人员住宿。北京医疗队的到来,彻底改变了会川医院医疗条件。

他们带来的从外科、妇产科、眼科全套手术器械、手术床、产床、病床、显微镜到被褥床单、针管、针头、枕巾、消毒巾、手术包等大量医疗设备及办公用品,总价值达十多万元,为业务开展提供了设施保障。器械装备有了跨越式提高,诊疗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。

医疗队伍中有从日本昭和医学院校毕业,回国后又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深造,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、北京市二院等医院工作的著名内儿科主治医师张中凯;毕业于日本九州高等医学专门学校,在沈阳医学院、北京市二院工作的外科医师张式贤;毕业于白求恩医学院,先后在北京市协和医院、同仁医院、北京月坛医院工作的宋瑞芳;毕业于北京市助产学校的徐文等理论功底扎实,业务技术精湛,临床经验丰富,医德人品高尚的医疗专业人员,使得医院以前无法解决的疑难病症都能够得到准确诊断和有效治疗,业务项目广泛展开。从妇产科的剖腹产、子

官肌瘤诊断和切除,宫外孕治疗到外科的肝、胆、脾切除术、胃大部切除以及外伤、骨折、车祸等危急重症的抢救治疗都能够普遍开展,肝炎、肺结核,特别是当时治疗效果不好、死亡率极高的细菌性、中毒性痢疾都能够得到有效预防救治。

北京医疗队员还运用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,为全县卫生系统培养了大批人才,培养学员近百人。从基础理论学习到临床应用,都是通过言传身教,谆谆教导,手把手指导,使得大批学员不但掌握了基础理论,而且提高了临床实践技能和业务水平。从根本上解决了卫生技术人员不足问题,充实了全县卫生队伍力量,提高了卫生队伍医疗水平,特别是解决了当时计划生育手术技术力量薄弱问题,有力的推动了全县医疗及计划生育手术的开展,为全县的卫生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在培养的人才队伍中,有许多都成为全县卫生系统的骨干力量,如当时卫生系统的黄兴芳、马淑兰、李彩英、张荣英、田春英、石海玉、边永秀、杜凤英、吴正波等。他们还培育出了一批医疗领域杰出人才,如顾鸿义、杨作平、张建清、容渭德、黄如英、赵彩云等。

1973年开始,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,医疗队人员陆续返回原籍或调任。1973年8月,李雅贞调任西专医院工作。1974年,林建国调走,郭裕根退休回原籍。1975年,凌金儒调离。1976年,何道民退休回原籍。1978年,张式贤调任西专医院工作……1986年,最后一名医疗队员王维祺退休回原籍河北涞源。



中共创建、领导的第一个气象台

□周铁钧

1944年,美、日两国的空战、海战进入“白热化”,美军空袭侵华日寇在中国华北、东北等地的驻军时,急需中共解放区的气象资料,为此向中共中央提出“建立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观测网”的请求。

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战大局,积极与美方合作,派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与美方商谈。起初,美方以共产党不懂气象技术、缺乏器材为由,提出由美方负责在解放区建立气象观测点。王诤果断拒绝,指出:“只要通过培训,共产党人是可以掌握气象观测技术的,也完全有能力担负起解放区建立气象通信网的任务。气象观测点必须由中共建立,这是主权问题,不容谈判。”

经反复磋商,美方最终同意中方意见,并达成“协助中共培训技术人员,为解放区提供气象、通信器材”等项协议。

1945年3月,中央军委从部队抽调21名战士组成训练班,由在延安大学任教的气象专业毕业生、中共党员张乃召任队长,学习气象观测和无线电通讯技术。

开班这天,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特意来看望学员,把自己的一套藏书《自然地理》送给训练班,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气象科学技术,为抗战大局作出贡献。经3个多月紧张学习,学员考试全部合格,被派往各解放区组建气象观测站。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在欢送大会讲话时说:“你们是我党第一批气象工作者。你们的工作开始,标志我党气象事业的诞生。”同年9月,中共中央决定:由训练班学员邹竞蒙、曾宪波等7名观测员组成延安气象台,张乃召任台长,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、领导的第一个气象台。

气象台坐落在延安凤凰山下,使用的多是美国提供的二手器材,经常发生故障。观测员就虚心向新华广播电台、通讯社精通机械、无线电技术的行家请教,自己动手维修、保养。有一段时间,国民党经常出动飞机轰炸延安,为保安全,观测员就抬人扛,把重要器材都隐蔽到山洞里,敌机离开后再抬出来,这样反复搬运,致使一些电器原件损坏,张乃召带人到北平、天津等城市采购,冒着生命危险带回延安。

全台唯一的动力设备是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,每天开始气象观测前,先要发动电机,冬天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,几个人轮流拽拉发电机皮带,有时要用1个多小时才能启动,人也累得肩臂酸痛、通身是汗。

观测点和探空站都设在200多米高的山顶,遇到雨雪天气,泥泞湿滑,观测员都要沿又窄又陡的小路上攀爬,有时还要背着沉重的汽油桶,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坡,摔得满身伤痕。不论骄阳似火还是风雷雨电,观测员都必须准时在露天观测,尤其是释放悬挂探空记录仪的氢气球时,要用一、两个小时,隔15分钟记录1次数据,直到接收不到探空仪信号才停止。

气象台除自身观测、获取资料,还担负着接收西北、华北等解放区6个观测站电传气象情报的任务,通过综合评估,预测解放区风力、雨雪、云雾、温度、气压等情况,提供给延安机场和美国军方,并由新华广播电台播出天气预报。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称赞道:“共产党人给了我们很大帮助,为我们海军和空军提供气象情报,这是极其重要的。”

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飞往重庆进行谈判,10月11日回航延安,这两次历史性飞行的气象资料,都由延安气象台负责提供。此期间,观测员们不敢丝毫懈怠,张乃召一直亲自带班,认真观测、精准预报,直到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延安机场安全着陆,他们才如释重负。

中国共产党创建、领导的第一个气象台,奠定了人民气象事业的发展基础,老一辈气象工作者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团结协作、密切配合、观天测雨、记录风云,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敦煌遗书中的中医学文献

□张天雁

20世纪初,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被发现。在5万多卷珍贵的文献资料中,也保存了我国许多传统中医学文献,共有50余卷,其中,医经10余卷,本草7卷,医方30余卷。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唐以前流传的中医学文献原貌,而且还保存了宋以后亡佚的医书。

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内容广泛,涵盖医经、五脏、诊法、伤寒、医方、本草、针灸、养生及医药史料等方面内容。首先保存了宋代以后亡佚的中医学文献,主要是本草学(即药物学)和脉经学文献,包括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新修本草》《食疗本草》《脉经》等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,传为神农氏所作,成书年代实在汉晋之间,共收药草365种,以符合一年的天数;南朝梁时,陶弘景又增补了后来发现的医用药草365种。《本草集注》是陶弘景为《神农本草经》作的注释,这两种中医学著作在宋代就失传了,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《本草集注》,不但使人们重见和了解千年以前古籍的原貌,而且还可以订正后世本草著作引用《本草集注》时,断章取义所造成的讹误以及《本草集注》在药物分类、采治方法等方面的贡献。

《新修本草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颁药典。唐高宗李治时,唐朝政府组织人力,由李勣、苏敬主编,共20卷,记载了9类844种药物,而且图文并茂,是唐以前药物学知识的集大成著作,但在北宋以后也失传了,只有日本保存了部分残本。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多件《新修本草》写本,弥补了日本传本之阙以及校订传本之误,也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第一部药典,比1542年颁布的欧洲纽伦堡药典早800余年,在世界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。

《食疗本草》是一部食治本草专著,是唐代同州(今陕西大荔县)刺史孟诜撰,唐玄宗开元年间精通医学的道士张鼎进行了补充,共收集药物207种,以专讲动植物的营养和药用医疗,是对唐代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,原著在宋代以后亡佚,只能从北宋唐慎微编著的《经史证类本草》摘录中略知一二。敦煌遗书发现的《食疗本草》,收药26味,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,药名朱书于首,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(温、平、寒、冷四种),不注药味,下述该药的主治、功效、服食宜忌、单方验方,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、修治、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。《食疗本草》的发现,一方面可以了解《经史证类本草》等引用取舍情况,另一方面可以探寻唐代食疗水平,是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。

《脉经》是指敦煌遗书的《无名氏脉经》,也是一种佚书,保存了一些失传的诊法、药方和脉学理论,有方剂13首,其中,有7首方剂记载详实,易于辨识,即桂枝汤、葛根汤、麻黄汤、覆花汤、滑石散、平胃丸及前胡汤。《无名氏脉经》源于晋代医学家王叔和《脉经》,对考证王叔和《脉经》古佚方提供了重要线索,也可以与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、张仲景的《伤寒杂论》等脉学专著相印证,弥足珍贵。

敦煌遗书保存了唐以前早期医学文献,能较好地反映医经类著作古籍原貌,主要有王叔和《脉经》《五脏论》、佚名的《明堂五脏论》《耆婆五脏论》《平脉略例》《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》《七表八里三部脉》《青乌子脉诀》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等,为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脉经》等传世古籍提供了重要的校勘依据,为《本草集注》《新修本草》《食疗本草》等古佚医籍的辑佚工作提供了难得的资料。

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,还有《灸法图》《新集备急灸经》《灸经明堂》等灸疗和针灸专著,其中,《新集备急灸经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绘有穴位穴位的灸法图谱;还有气功、辟谷、石药服饵、疗服石药中毒、方术禁方、房中术、佛家及道家的用方等,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医药学成就;还有医方文献,共发现1024首敦煌古医方,是隋唐五代医学家的经验医方,包括内、外、妇、儿、耳、鼻、喉、眼、口腔、皮肤等各科疾病医方;还有美容方剂,如面脂、面膏、乌发、洗发、香衣等;还有发现了少数民族医药文献,如藏医药文献,包括《藏医灸疗法》《藏医杂疗方》以及古藏文针灸图等5篇珍贵的古藏医药文献,为研究藏族医药学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藏医学研究资料;还有于阗文的《医理精华》和《耆婆书》,是印度医学的代表。

中医学文献在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地位,从阴阳五行学说以脏腑学说为中心的中医基础理论,从脉学诊断到内、外、妇、儿临床各科,从针灸到大量的古医方,从本草著作到医事杂论,从古藏医药文献的发现到独具一格的道医、佛医的展示,极大的丰富了我国隋唐前后时期中医文献。这些文献,引发了中外学者研究兴趣,罗振玉的《开元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》,为敦煌中医文献刊布之始。其后,王国维、李盛铎、唐兰、王重民、刘绍铭、向达、罗福颐、姜亮夫等中国学者与中尾万三、黑田源次、渡边幸三、小川环治等日本学者,都对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进行了研究。如今,敦煌遗书的中医学文献已经收入到马继兴、罗秉芬等编写的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》《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》等中。

丝路览胜

岷县境内的古城堡

□潘硕珍

间井哈古城:位于间井镇以西,哈(读作ka)古村之北的高岗上,新修的水泥公路与国道316相连。古城北面为开阔地带,适合放牧,有间井河自东向西流过。哈古古城呈正方形,城墙边长约180米,城门用长29厘米、宽14.5厘米、厚6厘米的青砖砌成,门额原题有“靖安门”三字(已毁)。城内有建于明末清初的藏经寺(俗称常家寺)。“同治初,以藏经寺为中心筑哈古古城。”

同治九年(1870年)闰十月,黑头勇攻哈古城,未克。民国十九年(1930年),漳县景平娃匪帮进入间井镇喇嘛堡,随即攻打哈古城。岷县县长耿雅轩急令警佐杨尚瓛(绰号杨胡子)率四乡抽调的门兵400多人,去间井平惠景平娃匪患,却被景平娃反击。此次战斗一结束,景平娃部又攻古城未得,旋即离开间井里。

1955年,岷县军马场总部设在哈古古城,拆毁藏经寺及其他建筑,修成职工宿舍、电影院、戏台等。

梅川索西城:据《岷州续志采访录·山水》记载:“洮水又东北五里经梅川城北而流。城即汉索西城也。马防(陇西郡太守马援之子)。耿恭从五溪样植谷出索西,与羌战,破之,筑索西城。”又据《岷州志·古迹》记载,索西城筑于东汉明帝时。《岷阳风韵》收入岷县诗人吴可谦凭吊索西古城的诗作:“索西迹杳古城荒,赤水涓涓吊兴亡。留得洮滨铁咀在,高岗千载诵恭防。”宋神宗元丰二年(1079年),在梅州(川)设立牧马监,经营畜牧业。宋徽宗崇宁



哈古城东城门



梅川古城南大门

二年(1103年),朝廷建梅川寨。宋宁宗嘉泰元年(1201年),金将乌古伦长寿伐宋,取梅川等寨。明初筑梅川城,置守御千户所。置岷州卫后,移所于城,置梅川递运所。明朝政府还设置梅川铺。

梅川旧城今名梅川村,北邻谈家庄,南邻夹裆

河,东依杏林村,西临洮河,距县城15公里。梅川旧城面积较大,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两边,大多为土墙木板装修门面的平房,铺子门板刷着红土,有些人家的大门有着明代江南移民的建筑风格。1938年5月,著名学者王树村涉足岷县梅川镇:“又五里

至梅川镇,有土堡,南面之墙前为洮河洪暴冲去,迄未恢复。”

古时候,不论大小城镇均设有城隍庙,别名“阴堂正府”。城隍庙多设于城镇都会繁华之地。梅川旧城就建有城隍庙。2007年,梅川村筹款重修了毁于文革时期的城隍庙,匾额“城隍庙”由岷州墨人(师伯淳)题写。每年正月十五至十七日和农历六月初四日,是梅川城隍庙会时间。

龙桑古城:在今梅川镇西坝村和中寨镇川都村(在小寨沟沟口,古称撒沟,原属小寨乡)之间的古城村(原属小寨乡),西面濒临洮河,洮河西岸即是西江镇的婆娑庄。据古城村90岁胡姓老人说,城墙有楼房那么高,毁于1958年启动的引洮工程。古城遗址内的居民搬迁到城东侧的半山上。2013年灾后重建时,部分居民又搬进建于公路两边的水泥楼房里。村庄里除了村委会、学校外,还保留引洮工程大坝遗迹及引水渠。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为古城庙会日子。届时,善男信女们要祭祀锁子阿婆,赛唱北路花儿。

据《岷州续志采访录·古迹》记载:“魏龙城废县,赤水废县;周和政废县,并在东北。”《地名大辞典》:“龙城县,后魏(西魏)置,北周废。故治在今甘肃岷县东北。”龙城即龙桑古城,此古城历史可追溯到西魏时期,与岷州治所溢乐县(今岷县)同样悠久。“乾元初(759年)复为岷州,治溢乐、祐川(治所在今宕昌川镇)、和政(今岷县城东北)三县。”

(连载一)